

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ĀN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第一卷

原著 [英] 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 巫新华 秦立彦 龚国强 艾力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ĪRĀN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第一卷

原著 [英] 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 巫新华 秦立彦 龚国强 艾力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 (英) 斯坦因著; 巫新华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5633-4361-X

I. 亚… II. ①斯… ②巫… III. ①考古发掘—发
掘报告—中国 ②考古发掘—发掘报告—中亚
IV. K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92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16

印张: 121 字数: 232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套 定价: 39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

季羨林

委员

孟凡人 齐肇业 刘庆柱 肖启明 何林夏
王 巍 白云翔 王仁湘 安家瑶 巫新华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总策划

孟祥林

主任

肖启明 孟祥林

副主任

何林夏 巫新华

委员

宾长初(常务) 刘哲双 陶 征 陈红妮 沈 明 姜革文

翻 译

巫新华 秦立彦 龚国强 艾力江

主 审

孟凡人 巫新华

责任编辑

刘哲双 黄 辛 梁小勤 伍 兵 蒋晓玉 陆 叶
唐长兴 龙鸿波 许晓琰 朱荣所 蒋 辉

校 对

韦晟妮 郑海梅 覃庆源 肖子娟 黄 曦 廖佳平

装帧设计

姚明聚

翻译分工

引言

巫新华

著作名称缩略表

巫新华

图版说明

巫新华

插图说明

巫新华

附图说明

巫新华

第1~7章

龚国强

第8章

艾力江 龚国强

第9~25章

秦立彦 巫新华

第26~30章

巫新华 秦立彦

附录

巫新华

地图

巫新华



汉译本前言

继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出版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的斯坦因的另一部学术巨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的汉译本又面世了。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墟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罗中、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发现颇多,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书、佉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400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建立,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之外,它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这些历史的“珍珠”。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使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所进行的科学考察,无疑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80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请乔伊斯(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索罗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



英博物馆副馆长)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资料,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W. L. 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F. W. 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科学者的良好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唐以来至今2000年间,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与祖国共兴衰,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协调,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都将是我们将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但作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①。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刘庆柱

2001年5月12日

^① 列宁:《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页。



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年版翻译。

斯坦因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涉及古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美术、建筑等多种学科，是一部语言现象复杂、学科门类繁多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我们在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解决所遇到语言和技术上的问题，拟订了一些原则，特在此略作说明。

一、本书原名《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及东伊朗探察之详尽报告》，作者无理地将我国新疆地区视为中亚而划出我国疆界之外，所谓“中国西部地区”则专指我国甘肃省地区，对此，我们一概不予承认，故此书翻译出版，定名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二、为保持原书的原貌，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由于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差异以及其他原因，斯坦因的原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斯坦因原书中的学术观点，有些不很正确；原书中的某些专业术语，表述上也不够规范。再者由于文化的差异，斯坦因原书中存在着一些知识性错误，如他把“开元通宝”误认为是唐高祖时期发行的钱币。尤其是斯坦因的探险考察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掠夺的性质，因此，他的一些观点具有自我辩护的成分。对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已在《西域考古图记》的前言中予以总的说明，在本书正文中则不作具体分析。因此，读者在征引该书观点时要妥加甄别。对原书的专业术语，我们一律保留原貌，但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于原表述词后加注说明，阐明译者的意见。

三、确保中文资料的准确性。斯坦因从他人译作中转引了《史记》、《汉书》、《唐书》、《大唐西域记》、《魏略》等我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经过多次转译，必然出现偏差和失误。为了确保引文的准确性，我们不根据原文转译，而是对照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直接抄录。原书附录A中引用了一些汉文碑刻，我们也不根据原文转译，而是把碑刻内容直接抄录下来。

四、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称等)，均按通行译法翻译。一些译名虽不甚准确，但学术界已约定俗成，故一仍其旧，不再另译。为便于读者准确把握原意，个别冷僻专有名词未作汉译；一些中亚古代文字写卷中的人名、地名，因目前尚无约定俗成的译名，故亦未作汉译。

五、保留原书的计量单位、文物编号及遗物排序等，以便于使用和检索。原书大量使用的计量单位(如里、英里、英尺、英寸、码等)，均不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原书中的文物编号、遗址编号，均保留原貌；原书中的附录排序和遗物排序，均有不连续的现象。这些，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均未作调整。

六、人名、地名及其他方面的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于汉译名后附注原文，以后出现不再加注。

七、为便于读者查找和对照，我们对“著作名称缩略表”作了汉译，并附上原文。

八、原书注释及正文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凡“著作名称缩略表”中已列有者，均用缩略语表示，凡“见上文(下文)某页”者，一律改为“见上文(下文)某章某节”；译本注文中征引著作的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原书注释以节为单位排序，译本以页为单位排序。



九、为了便于排版,有些图版按原图的一定比例缩小,缩小比例标示于各图版的图题上。如某图版按原图85%的比例缩小,则在该图版的图题标示:(缩85%)。

十、地图翻译的说明。本书地图所用地名多为20世纪初地名,许多地名俱是当地口语的音写,与现今地名出入较大。为保持原图资料的完整性,我们在保留原图音写地名的基础上,着重译出重要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绿洲、村庄等名称和各类遗址、遗址名称,对那些无视我国主权的地理命名,我们一律不予承认,并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了修正。本书地图的翻译以国家测绘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甘肃省测绘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相关地图、地名资料为主要依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11月



引言

我按照 1906~1908 年的探险经历和成果,为本书所述的探险制定了计划。在 1906~1908 年的探险中,我穿过整个新疆,考察古代遗址,进行地形学测量,一直到达中国的最西边(包括西藏)。尽管那一大片地区现在很荒凉,历史上却曾有人居住。那里的考古学问题和地理学问题令人着迷,吸引着我重新来到这片亚洲内陆的广袤地区。在那儿,古代遗址早已为沙漠所埋,从而为我们保存着古代文明的遗物。这个文明在印度佛教、中国、希腊化近东地区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发展并繁荣了一千多年。我在整理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成果时,多次想到能否再次进行卓有成效的探险,以补偿上次考察时由于时间紧张,一些遗址被遗漏的缺憾。这一想法一直被迫搁置一边。然而,那浩瀚沙漠的召唤,却是不可抗拒的。

第二次探险后,我给大英博物馆带回了大量遗物。那些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使我在英国一直忙到 1911 年。即使在我重新回到印度,开始在印度西北边界和克什米尔那片我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考古工作时,我仍得花大部分时间在《西域考古图记》的撰写上。1912 年,出于多种考虑,我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份思考已久的计划,希望能到中亚进行第三次探险(这时撰写《西域考古图记》这个繁重任务还远未完成)。我陈述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当时中国和俄属突厥斯坦地区的政治条件比较有利。我的两个朋友——印度政府外交国务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Henry McMahon),大英帝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爵士——劝我尽早启程。考虑到后来我们目睹的变化,我尤其要对他们充满洞察力的建议表示感激。

提议进行第三次
探险

刚上任的印度总督哈定勋爵(Lord Hardinge)对我以前的探险一直深感兴趣。我的新探险就在这样令人鼓舞的关怀下开始的,如今我回想起来仍然心怀感激。印度政府给予我慷慨的帮助。对此,我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朋友。一位是哈克特·巴特勒(Harcourt Butler)爵士。他当时是总督政务会的成员、教育部开明的部长,后来又相继担任联合省总督、缅甸总督。另一位是印度考古总监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爵士。作为政府在考古方面的首席顾问,他对我的历次中亚探险的准备工作,以及探险成果的整理,一直给予极为热忱、有效的帮助。我的提议在 1913 年 4 月得到大英帝国印度国务大臣的最后批准。印度政府给我拨款 3 000 英镑,以支付未来三年探险开支的预算。^①反过来,我在探险中得到的任何文物等“考古收益”,印度政府都享有独家所有权。将要在新德里成立的印度人种学、艺术和考古博物馆,是我未来“收获物”的第一个受益者。就这样,1913 年 7 月,我获准从克什米尔出发,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

探险计划被通过

在我的探险中,地理考察将占很大比重。对此,印度测量局一开始就对我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帮助。当时的印度总测量员(Surveyor-General)锡德尼·布拉德(Sidney Burrard)爵士、上校

印度测量局的帮
助

^① 后来在 1915 年又追加了一笔拨款,数额是 12 000 卢比。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把大量文物运到印度去的费用增加了;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后,我所到的地区物价大幅上涨。



对我的这一部分计划,给予了热忱帮助。我以前的地形学测量活动和测量成果的出版,都大大得益于他。他还同意把印度测量局的副总管助理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Rai Bahadur Lal Singh)调拨给我,作我的助手(拉尔·辛格是我经验丰富的老伙伴)。印度测量局专门拨款,负担雇用这些测量员的费用。此外还提供所需的一切测量器械,包括我和另一个助手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Mian Afraz-gul Khan)将要用到的器械(关于阿弗拉兹·古尔的帮助,下文将会说到)。

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面积地进行地形学考察了。与此相关的,我在此还要表达对皇家地理学会的诚挚谢意。该学会不仅借给我一些测量设备,还给予了我道义上的慷慨支持。已故的学会秘书长约翰·凯特勒(John Kettle)爵士对我始终表示支持。他的支持永远伴随着我,我从中总是能得到真正的鼓励。

地理问题和历史问题是联系在一起

我之所以花很大一部分工夫和精力来直接研究地理学问题,是出于两个很重要的考虑。其一,我探险时将穿过内陆亚洲的某些地区。它们有的位于荒凉山区,有的在大内流盆地的荒芜、浩瀚的沙漠中,至今没有系统测量过,甚至没有画过地图。其二,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地区的确是地球上最不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但如果考虑到它们的历史,它们就是能够说明地理特征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极合适的例子。而人类活动,就反映在历史和考古学遗物中。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内陆亚洲:地理作为历史的一个因素”。^①在那里我已经详细讨论到,对于研究那一大片亚洲地区的历史和文物的学者来说,为什么很有必要研究该地区的地理特征。在那篇演讲中我还说到,科学地考察那一地区留下的人类历史踪迹(包括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对于研究人们争论已久的一些地理变化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地形学测量记录

前面简单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一地区,对地形学事实的准确记录,与考古研究关系重大。因此,我对印度测量局的热心帮助尤为感谢,因为印度测量局使我能够在出版本书的同时,发表了第四卷中的那些详细地图。这47张地图比例尺是1:500 000,是在台拉登(Dehra Dun)的三角测量处绘制的。它们汇编了我三次中亚探险的全部测量结果。这些测量活动,包括我和助手一直持续进行的平面测量,以及在条件允许时进行的三角测量和天文观测。测量范围足足跨28个经度,8个纬度。由此足以说明,为了这些实地的系统测量,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即便在这些地图上,有些地区仍然看起来没有测量过,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考察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地面是令人生畏的浩瀚沙漠,或是与沙漠同样荒凉的高山区。而要深入这些地区,从自然条件上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绘制地图

由于地面辽阔,每次探险带回来的资料性质又不同,因此这些地图的编绘、复制都很困难。这一工作是1916年开始的。之后,战争对测量局施加了很大压力,但大部分地图的编绘工作就是在这艰难时期完成的。因此,对相继负责三角测量处的杰拉德·勒诺克斯-卡宁汗姆(Gerald Lenox-Cunyngham)爵士上校、E. A. 唐第(Tandy)上校、尊贵的H. 麦克·考威(McC. Cow-

^① 参见《地理学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925年,第65卷5~6月刊,377~403页,473~498页。



ie),我都要特别致谢,感谢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使得地图编绘工作能在1922年夏最终完成。

这些地图中描绘的,是亚洲内陆中一块广大但却轮廓清晰的地区。它过去曾是印度、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交会点。它现在的状况,以及它曾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吸引了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实地考察中,在比例尺、时间、所受过的训练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一直致力于把目前的地理特点尽可能准确、详细地记录下来。在考察结束后的几年,我本人在地图的绘制、复制的各个阶段,对地图的修订花了很大力气。^①为此,我撰写了一个详尽的《备忘录》。在印度总测量员 C. H. D. 莱德(Ryder)上校的批准下,这份《备忘录》作为《印度测量局记录》(*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的第十七卷出版了。^②在这本《备忘录》中,我记录下了在我的指导下进行的全部测量活动,讨论了每一地区的重要地理特征。对每张地图利用的资料,也提供了详细的注释。《备忘录》还详细地解释了进行地图汇编时用的方法,地理细节是如何表示的,以及当地地名的情况。对该《备忘录》的出版,我尤其要感谢印度测量局三角测量支局(如今改名为大地测量支局)的官员们。他们在编绘我的探险地图资料时,提供了各种极为热心的帮助。尤其要感谢的是:R. A. 沃科普(Wauchope,如今已故)上校、H. 特纳(Turner)上校、J. 德·格拉夫·亨特博士、F. J. M. 金(King)少校、K. 梅森(Mason)少校、W. E. 伯里(Perry)少校。

地图备忘录

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老伙伴。关于他在我第三次探险中所做的工作,《备忘录》和地图本身都是充分的证明。^③他在无水的沙漠地区和大风劲吹的山区进行测量,经受了很多人严峻考验,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读了本书的人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拉尔·辛格的工作

我另外还选了两个印度助手,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的这支小探险队。事实证明,我选择他们是极为幸运的。其中一个助手是奈克·夏姆苏丁(Naik Shamsuddin)。他本是乔治王所属的孟加拉坑道工兵部队的一个下士,如今已经晋升为“贾玛达尔”(Jamadar)。我是从那一杰出部队的 J. E. 迪吉(Dickie)少将阁下那里,把他“租借”来的。我发现他很能干,而且在需要技术才能的所有工作上都是把好手。另一个助手是年轻的军事测量员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他是个帕坦(Pathan)人(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译者),属于虔诚的卡卡海尔(Kaka-khel)家族。当时他是开伯尔(Khyber)步枪队的一名印度士兵。1912年,在乔治·鲁斯·克伯尔爵士(George Roos-Keppel)的推荐下,我在印度西北边境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雇佣了他。我很快发现他精力旺盛,聪明过人,在野外考古工作中,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帮手。他

其他印度助手

① 大多数情况下,我先是校订地图的草稿、样稿等,当时我的考察报告中的相应章节还没有写。因此,编绘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或是绘图员的小错误,逃过了我的注意。

② 见《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图备忘录》(*Memoir on Map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出自奥雷尔·斯坦因爵士1900~1901、1906~1908、1913~1915年的测量活动,由印度帝国高级爵士奥雷尔·斯坦因撰写。附录的撰写者有:皇家工兵部队总指挥官 K. 梅森少校;理学博士 J. 德·格拉夫·亨特(J. de Graaff Hunter)。台拉登三角测量处1923年出版。第十三卷,共208页,29张图版,12张地图。

③ 我尽量让拉尔·辛格跟我走不同的路线。地图上标明这些路线的方法,参见《备忘录》60页之后。



对地形问题敏感而且感兴趣,这使我还能把他用在地形测量工作中,收益很大。^①我们回来之后,他由于能力突出、勇气可嘉,获得了麦克格雷格尔银质勋章(Macgregor Silver Medal),并进入了印度测量局,担任副总管助理。自那之后,米安·阿弗拉兹·古尔·汗(如今叫汗·萨西伯·阿弗拉兹·古尔·汗[Khan Sahib Afraz-gul Khan])工作成绩杰出,证明把他召入印度测量局是完全正确的。

探险的范围

前面已经说过,这次探险的考古学和地理学目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探险范围很大。直到我1916年探险归来回到克什米尔(Kashmir),探险持续了近两年零八个月,行程将近11 000英里。我探险的目的,不只是考察古代遗址,为博物馆收集新资料,以供文物学和语言学之研究。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凡是能为古代中亚道路所穿越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线索的东西,我都要观察和记录下来。曾有几百年,那些道路都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征服的影响,就是通过它们传播的,从而把中国和印度、近东联系在了一起。有鉴于此,本书的地理范围从中国西部的河西走廊,穿过整个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到阿姆河的最上游,一直到伊朗;从南面的兴都库什(Hindoo koosh)山,经过准噶尔,一直到准噶尔东北的内蒙古。这次探险回来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的时间很紧张,没能发表一份关于探险的个人回忆录(这样的回忆录能指导读者,理解本书中的考察范围和各部分的意义)。因此,下面我就有必要概述一下考察活动的内容。

我从克什米尔出发后,经过达丽尔(Darel)和丹吉尔山谷(Tangir)到达喀什(Karshgar),恰好条件比较有利,使我能够穿过达丽尔山谷和丹吉尔山谷。那是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地区,欧洲人从未涉足过。我经过之后,那一地区又陷入了部族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再次对外封闭了(见第一章)。^②在那里,我追寻了一条古道。在佛教时代,中国朝圣者就是顺着它到达印度河的。然后,我经过亚辛(Yasin),穿过德尔果德(Darkot)冰川山口(那个山口曾是一次著名的中国战役的地点),然后越过格拉姆巴尔(Karambar)河和罕萨(Hunza)河源头的那些雪山,在塔克墩巴什帕米尔(Taghdumbash Pamir,今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境内——译者)到达了我国领土。从那儿到喀什的途中,我在大色勒库尔谷(the great Sariko Valley,今蒲犁县全境——译者)考察了某些古代遗址,并考察了一条新道。那条道是顺着难走的喀拉塔什(Kara-tash)河河谷朝下延伸的,迄今为止还没人探索过(见第二章)。

马继业爵士的帮助

我在喀什短暂休整了一下,住在我的老朋友、好客的马继业爵士家里(他是大英帝国的前任驻喀什总领事,现在已经故去)。我利用这段时间组织了骆驼队。而且,马继业爵士对我未来的探险,给予了实际帮助,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使我受益匪浅。自从革命之后(指辛亥革命——译

^① 1915年2~3月,阿弗拉兹·古尔·汗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和物资匮乏之苦,成功完成了穿越罗布泊的补充测量工作。参看本书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之后。

^② 本书第四卷《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穿过齐拉斯(Chilas)、达丽尔和丹吉尔时,所走的路线图》,是在第1章已经付印之后编绘的。那件地图体现了在我的指导下,拉尔·辛格进行的平面测量的结果。测量的比例尺是图上1英寸相当于实际距离2英里,测量覆盖了1 200平方英里的地区。那一地区以前从来没有哪个欧洲人画过地图,甚至根本没有欧洲人到过。



者),中国在新疆的行政管理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就是因为马继业爵士的一直关注和大力支持,以后才避免了官方对我计划的严重阻挠。他很有影响,而且富有远见,使我在中国的整个旅程都大为受益。对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从喀什出发后,我顺着一条没人考察过的沙漠古道,贴着天山最外围走,来到了巴楚(见第三章第一、二节)。然后,我试图从巴楚出发,穿过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的“沙海”,直行到和田(khotan)河畔的麻扎塔格山(Mazār-tāgh)。经过艰难跋涉之后,我被可怕的山阻断了去路。但此时我已经获得了可靠的证据,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有一条古代山脉(在风蚀作用下,它如今已经完全消失),曾经把那些沙山和巴楚周围孤立的石山连在一起。之后,我顺着叶尔羌(Yarkand)河走,然后逆和田河的干河床而上,到了麻扎塔格山。在那儿的一个废堡垒附近,我们获得了很多藏文文书。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座佛寺(第三章第三、四节)。

到巴楚及和田去

到了和田的旧营地后,我从和田古都和其他古代绿洲遗址上,获得了一些小文物(见第四章第一、二节)。那年冬天,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罗布沙漠(Lop Deserts)。到那儿去有将近 700 英里的路程,因此我们必须走得很快。尽管如此,我还是重新探访了达玛沟(Domoko)以远的古代居民点,以及尼雅河(Niya River)尾闾以远的居民点,它们如今已经成了沙漠。在尼雅(Niya)遗址,我又注意到一些具有明显考古学价值的现象,并发现了一些文物,对我以前的考察是个补充。文物中包括又一组写在木头上的佉卢文文书(第四章第三、四节)。1914 年初,我们到达了靠近罗布沙漠的最后一块有人居住的地方,之后考察了若羌(charkhlik)以南的两个小遗址。接着我们又一次在米兰(Miran)开展工作,发现了鄯善“东故城”佛寺中的早期壁画和其他遗物(见第五章)。在那里,拉尔·辛格与我会合了。我们已经分离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除了其他测量工作之外,他顺着昆仑山主脉朝东进行三角测量,大约跨 5 个经度。

在和田与米兰之间进行探险

若羌爆发了一场为时不长的“革命”,使我逃开了严重威胁着我的那些阻挠活动。于是我开始在无水的罗布沙漠地区,进行计划已久的考察。我发现了古代楼兰的两个遗址,是在公元后的最初几百年间被放弃的,最后成了沙漠。从中还发现了有价值的遗物。当我们朝北走,穿越风蚀沙漠时,发现了一系列干河床。曾灌溉着汉朝楼兰的那条“干河”,在流入古代罗布泊时,形成了一个三角洲地带。我们发现的干河床表明,那个三角洲朝南延伸了相当远(见第六章)。^①

开始在罗布沙漠进行考察

我们在楼兰的中国城堡及其周围重新展开工作,并发现了一些过往人员留下的遗物。那些过往人员是顺着到塔里木盆地去的最早的中国古道来的。在公元前后 1 世纪的墓穴中,除其他遗物外,我们还发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纺织品,其中包括精美的中国花绸(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花绸),显示出明显希腊化艺术影响的毛毯(第七章第一至六节)。我还朝东北方向的沙漠进

古代楼兰的遗物

^① 在第二次探险和第三次探险中,我们穿过罗布沙漠时记录下了一些具有地理学和考古学意义的细节情况。为了体现所有这些细节,本书第四卷专门收了一幅“罗布沙漠地图”,比例尺是图上一英寸等于实际距离 5 英里。

这张地图比例尺比较大,并根据第四卷普通地图中的 29、32 号进行了增删和修订。在本书的第六至八章、第二十章第 3 节付印时,台拉登的测量处编绘成了这张地图。第六至八章、第二十章中说的所有地形情况和其他细节,最好参看这种地图。



行了勘察,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小堡垒、一座偏远的烽燧,以及附近一处墓地,其中极为完好地保存着古代楼兰土著人的尸体(见第七章第八节)。

穿越罗布泊的
中国古道

通过以上获得的线索,我们开始了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就是穿越结着盐壳的古代罗布泊(Lop-nor)和罗布泊周围同样荒凉的无水区,追寻那条中国古道。在同中亚进行最早的贸易和军事活动时,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条道。由于很幸运的考古发现,以及中国史书中有限的线索,我把这条古道一直追踪到了它的东端,即敦煌沙漠中的疏勒河(Su-lo-ho)古代尾间(见第八章和第九章)。

汉长城的最西段

我现在到达了汉长城的最西段。第二次探险考察结束以来,这里对我就特别有吸引力。我追踪了几段以前没有考察过的汉长城,它们从敦煌绿洲西北的沙漠,延伸到敦煌以东,一直到安西。汉长城的烽燧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些早期中国木简(第十章第一、三节)。在追寻汉长城的过程中,我再次拜访了敦煌绿洲东南的千佛洞。除了其他文物外,我在千佛洞又获得了约570件保存完好的佛教经卷,这样就大大补充了我在1907年从藏经洞大宝库中获得的古代汉文手稿(见第十章第二节)。

考察汉长城,一直
到毛眉

从1914年4月中旬起,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继续朝东追踪和考察中国汉长城。我先是顺着疏勒河走,一直到了玉门县下游的疏勒河大拐弯处。然后我穿过沙漠,到了肃州河和甘州河汇合处的毛眉(Mao-mei,即毛目,现在的鼎新——译者)绿洲(见第十一、十二章)。为考察这段汉长城,我们走了250多英里。在废烽燧上发现的中国木简表明,这段汉长城最初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左右修的,以抵御匈奴的入侵。一直到东汉时期,都有士兵在这里戍守。

顺着黑河考察

由于得到了肃州(Su-chou)道台的友好支持,我得以从毛眉出发,顺着黑河(Estin-gol)走,进入了蒙古最南部的一个地区,并在科兹洛夫上校(Kozlov)发现的黑城及其附近,考察了一些遗址(大多是党项时期和蒙古人占领的元朝时期的)。我获得了大量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以及其他文物。此外,我还对黑河河谷和黑河三角洲,做了地理学上的有趣考察。这个河谷和三角洲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通道。我们的实地考察证实,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此地的描述是极为正确的(见第十三章)。

穿过北山山脉,到
准噶尔

我们从黑城朝南走,穿过没有测量过的沙漠山区,到了甘州(kan-chou)城,然后出发到南山的那些高山中去。在南山中,7月中旬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使我无法站起身来。但是,正像我预期的那样,拉尔·辛格凭他的精力,考察了甘州河的源头,从而完成了我们1907年在那一广大地区未竟的地形学测量(见第十四章)。8月末,我们再次到达毛目,从那里出发艰苦跋涉了一个月,穿过了几乎无人考察过的地面,其中包括极为荒凉的北山山脉和天山最东端(见第二十章)。之后,我们顺着天山的北麓走,途中我熟悉了东准噶尔的一些地区。在中国的中亚扩张史上,这些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我们到达了北庭的古代遗址,并顺着一条古道穿过天山,来到了吐鲁番(Turfan)盆地。那条古道只有唐朝文献提到过(见第十六章)。

冬天在吐鲁番遗
址展开工作

吐鲁番地区的绿洲和绿洲附近有大量古代遗址,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吐鲁番盆地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见第二十七章)。以前先后有几个探险队发掘过这些遗址,成果丰



硕。但是，我们仍有余地进行有效的考古工作，还可以对一个很有地理学价值的地区进行详细测量。我们在吐鲁番盆地呆了一个冬天，在此期间详细考察了所有比较重要的遗址。除了其他文物外，我们从佛寺遗址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壁画（见第十八章）。我们考察了阿斯塔那（Astana）附近的一个大墓地，成果尤丰。墓穴中出土了大量唐朝早期的遗物，包括花绸、小泥塑，和其他具有艺术价值或工艺价值的物品（见第十九章）。

我曾经从吐鲁番出发，匆忙拜访了天山以北的省府乌鲁木齐。那次拜访中，我再次见到了我的老朋友、前清官员潘震潘大人。^① 在我以前的历次探险中，他都给我以帮助。这次，他替我挡住了官方的阻挠。这位朋友 1926 年在任上故去，整个新疆（New Dominion）都在哀悼他，纪念他的高尚人格、真正的学问和少见的正直。我希望在此对他表示我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到乌鲁木齐去了一趟

这些月份里，拉尔·辛格在南边无水的库鲁克山区进行了广泛的测量。1915 年 2 月开始，我也在库鲁克塔格（Kuruk-tagh）西段的沙漠地区开展工作，并考察了“干河”附近的古代墓葬（“干河”曾流向楼兰）。我的这些工作对拉尔·辛格的测量是个补充。同时，阿弗拉兹·古尔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了一段测量，丰富了我们对于罗布沙漠的地形知识（见第二十章）。我在库鲁克山西麓与孔雀河（konche-darya）之间（孔雀河曾经是“干河”的补给水源），考察了一串遗址。从中国来的古代商旅，正是经过这些遗址，到达塔里木盆地北边沿的那串绿洲的（见第二十一章）。之后我们顺着塔里木盆地北边的绿洲朝西走，追踪了中国古书上说的“北道”，一直到了库车（kucha）。我们考察了从前这个大绿洲边上的一系列古代遗址。它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历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如今却都已是沙漠（见第二十二、二十三章）。拉尔·辛格在早春季节允许的情况下，顺着天山测量到了尽可能高的地方。我自己则沿着现在的车道，迅速行进到了喀什，一路上熟悉了以前没到过的地面（见第二十四章）。

在库鲁克塔格考察

在喀什逗留期间，我忙于做出安排，保证我收集的 182 箱文物能安全运到克什米尔去。1915 年 7 月中旬，我从喀什出发了，准备穿越俄属帕米尔（Pamirs）和阿姆河上游的谷地。由于两个人的热心帮助，我的旅程十分顺利，他们是俄国驻喀什总领事梅斯切尔斯基公爵（Prince Mestchersky）和掌管着帕米尔地区的 I. D. 加盖罗上校（Jagello）。我顺着大阿赖（Alai）谷地下来，走的是马里纳斯（Marinus）所说的从中国贩卖丝绸的古道。然后我穿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它们把阿姆河的几个主要源头分隔开来。接着我到达了阿利丘尔帕米尔（Alichur Pamir）和大帕米尔（Great Pamir），中国的武装部队以及中国的朝圣者，都曾经过这里（见第二十五章）。当我穿过瓦罕（Wakhan），并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加兰（Gharan）、罗申（Roshan）、舒格楠（Shughnan）、达尔瓦孜（Darwaz）山谷上上下下的时候，我考察了一些年代古老的堡垒遗址。一路上我观察到，这些地方居民的人种、语言和生活方式都颇有古风（见第二十六章）。在附录 C 中，T. A. 乔伊斯（Joyce）先生讨论了我在这里收集的人类测量学资料。在喀拉特金（Kara-tegin），我再

穿过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谷地

^① 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五节，插图 298。自从我 1900 年第一次探访和田后，潘大人就一直帮助我。参考《古代和田》，第一卷 237 页之后、507 页等；《和田废墟》（*Ruins of Khotan*），21 页、200、214 页之后；《沙漠契丹》，第一卷 16 页，第二卷 421 页之后；《西域考古图记》，第一卷 10 页、311 页；第三卷 1185、1273 页。



次来到了通往巴克特拉(Bactra)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之后我穿过布哈拉(Bokhara)山区,到了撒马尔罕(Samarkand)。我从那里乘坐外里海大铁路,来到了波斯。接着我在波斯—阿富汗(Afghanistan)边界走了三周(虽然走得很快,但收益还是很大的),1915年11月末安全抵达锡斯坦(见第二十七章)。

在锡斯坦的考察

那一个冬天我都在锡斯坦考察。锡斯坦虽然不大,但地理上却很像塔里木盆地。^① 我就成功地考察了科赫依瓦贾(Koh-i-Khwaja)圣山上的一个大遗址,发现了萨珊时期的壁画和其他遗物(见第二十八章)。在现在的赫尔曼德河三角洲(Hermand delta)位于波斯境内的部分,我们考察的遗址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时期的(见第二十九章)。但在南面的沙漠中(那一沙漠曾有一条支流灌溉着),我们发现了远为古老的遗址。^② 在那里的风蚀地面上,我发现了史前居民点的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石器和大量彩陶。这些彩陶跟外里海地区、两河流域、俾路支斯坦、中国西部等遥远地区发现的遗物,在类型上极为接近。如今这些史前居住区都已是沙漠。我在沙漠上还发现了一条堡垒线,肯定是伊斯兰教之前的。奇怪的是,它使我想起了遥远的甘肃边境上的中国古代烽燧线(见第三十章)。之后我坐骆驼顺着锡斯坦和努什吉(Nushki)之间的车马道走了三星期,来到了铁路的起点努什吉。就这样,1916年2月末,我的旅程结束了。

收集品存放在斯利那加

四个月之前,在拉尔·辛格的押送下,我收集的文物已经安全抵达了克什米尔。当时和之后的几年,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弗莱德·H. 安德鲁斯(Andrews)先生一直都负责着斯利那加(Srinagar)的克什米尔技术学院(Technical Institute of Kashmir)。这一幸运的条件,使我能把收集品存放在这位艺术家朋友那儿。他参与了我以前收集品的监管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东方艺术和工艺都很熟悉。这使他在整理、仔细研究和描述数以千计文物的繁重工作中,再次成了我的一个最有益的伙伴。出于上述原因,我要求把新收集到的文物暂存于斯利那加的安德鲁斯先生那儿。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使我很高兴。

F. H. 安德鲁斯先生对文物做的工作

1917~1922年间,斯利那加的安德鲁斯先生在处理繁重的行政和教学事务之余,把闲暇时间都用在准备本书的“文物目录”上了(这些目录主要出自他之手)。此外,他还将这些年的寒假,以及后来若干年的冬天(那些冬天他受命于印度政府)用于一项繁重的工作,就是把我从佛教寺院遗址带回来的很多壁画布置起来。这些壁画都是用蛋青调和颜料画在灰泥上的。由于它们将被存放在新德里(New Delhi)的一个专门为此开办的临时博物馆中,并将在那里展出,因此就必须进行极为精细的处理,保证它们能经受得住天气的影响和其他风险。^③ 这一工作如今

① 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国家》(India and Adjacent Countries)系列地图中的30号(1:1 000 000)中,可以看出锡斯坦盆地的主要地区。为查阅方便,在台拉登的测量局中复制了这一地图的一部分,并作为一幅单独地图,收在本书第四卷中。

② 为了充分说明赫尔曼德三角洲南边沙漠中古代遗址的位置,我在台拉登复制了印度测量局的30号地图(“只为公用而出版”),并加了必要的补充。该地图作为单独地图收入了本书第四卷。

印度政府人员总管同意我复制这些地图,我在此表示感谢。

③ 有的壁画占地面积长达16英尺,高达10英尺。安德鲁斯先生在处理 and 布置这些壁画时,用了很多极为巧妙的办法和特殊材料。参看他的文章,见《考古学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1921~1922年刊,98页之后。

